



幼獅文化書系

文化視野下的 《四庫全書總目》

周積明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文化视野下的 《四库全书总目》

周积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周积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5006-4157-5

I. 文... II. 周... III. 四库全书-图书目录-研究
N. Z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5718 号

书 名: 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著作权人: 周积明

特约编辑: 朱旭辉

责任编辑: 潘平

封面设计: 颜雷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E-mail: cyph@eastnet. com. 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图书发行部

电话 010 64010813 传真 010 64033760

印 刷: 河北遵化市胶印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32 104mm×203mm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自序

《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出版已经十年了。十年来,这部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92年我到香港大学,很惊讶地发现中文系好几位学者的书架上都有这本书。1998年我到台北参加“海峡两岸四库学讨论会”,不少文献专业的博士、硕士生告诉我,他们的导师要求他们读这本书。1999年我第二次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朱鸿林研究员告诉我,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明清学术史”的课程,指定学生读《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国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王余光教授指导的九四届硕士研究生阮阳在其学位论文《二十世纪的〈四库全书〉的出版和研究》中,以《〈四库全书〉研究的新视角》为一节,专章评述《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意义,文中称此书“以独特的切入点、宏阔的视野、详密的论证,破译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密码,把《四库全书》研究推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四库学’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四库学’乃至‘目录学’的发展开拓了视野,开辟了新径”。她的评价虽或过誉,但把《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作为大陆地区“四库学”的重要成绩之一,大约还是不错的。

然而,《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出版时只印了2000

册,出版此书的广西人民出版社早已库存告罄。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慷慨表示愿意出版此书的修订本,我当然是十分高兴和深为感谢的。

十分抱歉的是,十年前出版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由于当时的出版水平和我自己的疏漏,书中的问题很多。这次出版,我在保留原书基本文字和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对全部引文进行了校核,对文中的错字、漏字进行了修正,书后则增加了《参考书目》。与此同时,对原书第四章作了结构上的变更,把相关内容分别并入或分立为其他章节。原书后附有陈利媛女士整理的“《四库全书总目》论文索引”,因林庆彰先生编纂出版了《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年)》,其中所记录的“四库学”的论著更为详备,故不再附录。近年来,我围绕《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学”有一些新的研究,从中择出二篇,随附于后,以扩展此书的视野和内容。在全书修订过程中,科研处陈宜女士给予多方协助,藉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原《后记》中记述的“每天临睡前都要用小手把我的台灯调到适宜角度”的爱子小琛今天已是挺拔清秀的大学生。然而,在默默无声的岁月流逝中,仍然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这就是亲情和友谊。它们是我生命中的光彩和意义。

青少年时,我很喜欢普希金的一首诗:《纪念碑》。诗人自信地向世界宣称:“不,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灵魂将越出我的骨灰,在庄严的琴上逃过腐朽。”我不知道《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能够流传多久,但我相信,它不会速朽,因为,在它身上,我灌注了我的激情、思考和生命。

目 录

自 序	(1)
导 论:文化魂灵的追寻	(1)
一 《四库全书总目》与传统“四库学”	(1)
二 中国古典目录的文化品性	(7)
第一章 “以实心励实行,以实行励实用”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世价值观念	(21)
一 “古之圣贤,学期实用” ——对儒学经世务实传统的认同	(21)
二 “以实心励实行” ——“实学”本位的价值取向	(26)
三 历史合理性的解析	(45)
第二章 攻驳程朱,讥诋理学 ——《四库全书总目》的理学批判	(50)
一 性理之论,虚沓无本	(50)
二 “崇王道、贱霸道”,“窒碍难行”	(56)
三 “存天理、遏人欲”,“不近人情”	(57)

四 朱子一说,不能律天下万世	(65)
第三章 “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	
——《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71)
一 西洋科技“实有益于民生日用”	(72)
二 西学源出中土	(76)
三 “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	(80)
第四章 “剖析源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 高挹群言”	
——《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论	(84)
一 学术理念与文化保守意识的二重变奏 ——《四库全书总目》论学术文化形态与 运行机制	(85)
二 “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批评	(115)
三 “所重乎正史者,在于叙兴亡、明劝戒、核典章” ——《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论	(149)
四 “系统的文学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论	(171)
五 《四库全书总目》学术论的意义	(215)
第五章 《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方法和 批评风格	
一 传统批评方法的集大成	(216)
二 “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	(244)
余论 《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重估	
	(254)

附录 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	
——兼评张寿安研究员“乾嘉学术”的系列研究	
.....	(257)
“四库学”通论	(265)
参考书目	(294)

导 论 文化魂灵的追寻

一 《四库全书总目》与传统“四库学”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流程中,十八世纪可谓最后一个气象盛大的时代。

这一百年,包括了康熙朝的二十一年、雍正朝的十三年、乾隆朝的六十年以及嘉庆朝的五年。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雄才大略的励精图治,清帝国国力强盛,大一统规模达到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不曾具有的水准。美国学者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在《世界文明史》中不无艳羡地称许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八世纪,中国不仅在疆域和人口方面冠于全球,同时也是全世界管理得最好的、最文明的国家之一。”^①

这也是一个帝王堪可夸耀“文治”的“盛世”。在康熙、雍正二帝的亲自主持下,中国古代最大的字典——《康熙字典》、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并在域外拥有“康熙百科全书”之称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相继推出。十八世纪下半叶,大

^①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35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版。

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更成为“十全老人”乾隆帝标榜“文德”的一大盛举。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修书工程,它历时十五年之久,集中四千余人,共收录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如果把《四库全书》原抄本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逐页相接,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其宏大气象足以与万里长城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称它为“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应是当之无愧。

与《四库全书》推出几乎同步,撮举四库收录、存目书原委大凡的《四库全书总目》^①也应运而生。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征书伊始,乾隆帝就要求各省督抚“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以便廷臣检核、鉴别地方所呈书籍,进而选择“有堪备阅者”。各省遵照乾隆谕令,将各地搜集之书,分别“绎其要旨,摘叙节略,注明著书人姓名、年代及卷帙若干”,专折呈送朝廷。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借乾隆下诏访求书籍之机,提出开馆校书的奏折。在奏折中,朱筠具体提出编纂目录的设想:“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②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军机大臣决议:俟书籍汇齐时,“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③

四库馆开馆后,纂修官们每校阅一种书籍,便撰提要一篇,叙列作者爵里,记叙版本源流,撮举典籍要旨,考订文字,并提出应列、应抄、应存的建议。据《越缦堂读书记》载:当时

① 以下简称《总目》。

② 《笥河文集·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卷一,收入《办理四库全书档案》。

③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大学士刘统勋奏折。

各部类书籍的校阅均有专门学者负责,“经部属之戴东原(震),史部属之邵南江(晋涵),子部属之周书昌(永年)”。总纂修官纪昀、陆锡熊则在纂修官所撰各篇提要的基础上,笔削考校,或增删,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润饰。原本体例不一,行文详略迥殊,表达观点亦各异的原纂修官提要,经纪昀、陆锡熊“笔削一贯”后,从草创之作一变而为体例整齐、思想划一、“灿然可观”的新质文化产品。在纪、陆二总纂修中,陆锡熊早歿,纪昀出力最巨,此为乾嘉以来的学者所公认。如朱珪《知足斋文集·纪晓岚墓志铭》云:

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哀然巨观。其祭纪氏文亦曰:

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

阮元撰《纪文达公遗集序》云:

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

刘权之撰《纪文达公遗集序》云:

乾隆三十七年,朱笥河学士奏闻高宗纯皇帝,敕辑《四库全书》并搜罗遗书,特命吾师总撰《四库全书总目》,俱经一手裁定。

陈鹤撰《纪文达公遗集序》云:

我师河间纪文达公,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四十余年,国家大著作非公莫属。其在翰林校理《四库全书》七万余卷,《提要》一书,详述古今学术源流,文章体裁异同分合之故,皆经公论次,方著于录。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纪昀》云:

《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

集,小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扶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陆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

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

昭槁《嘯亭杂录·纪晓岚》云: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见称于世者,惟晓岚宗伯无书不读,博览一时,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澹而雅,人争服之。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云:

乾隆中,四库馆开,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赡博。

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

或言纪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陆敬安《冷庐杂识》卷一云:

《全书总目》二百卷,亦公所撰,说者谓公才学绝伦,而著书无多,盖其平生精力,已毕萃于此书矣。

李元度《纪文达公事略》云:

公胸有千秋,故不轻著书,其所欲言,悉于四库书发之。

清仁宗的《御赐碑文》亦云:

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

以上诸人中,朱珪是四库馆中的总阅官,刘权之是四库馆中的总目协勘官,其余几位亦皆与纪昀同时或稍后,他们的议论显然有确凿依据,卓然可信。

值得参考的还有日本学者前野直彬的意见,他在研究《总目》的小说论时指出:

《提要》是由各方面的专门学者分别执笔,但经总纂官纪昀的大加订正之后才定稿的。虽然小说类这部分的原稿究竟是谁写的,纪昀的改笔占多大分量,都不清楚,但反正这部分的论述无疑是为纪昀所完全同意的了。在这意义

上,认为《提要》的小说论即是纪昀本人的主张也无不可。^①

《总目》与纪昀思想的血脉相通,使笔者讨论《总目》时不得不经常地旁及纪昀的文化观念。

《总目》是中国古代规模最为宏大,体制最为完善,编制最为出色的一部目录书。它一经问世,便引起同时代和后世学子的瞩目与推扬。与纪昀交谊甚笃的王昶评说道:

《提要》二百卷,使读者展阅了然。盖自列史艺文、经籍志及《七略》、《七录》、《崇文总目》诸书以来,未有闳博精审如此者。^②

清人周中孚评价《总目》说:

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编》。^③

与张之洞合编《书目答问》的缪荃孙在《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序》中盛赞《总目》曰:

至于考证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宗旨,显微正史,遍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

积平生精力研读《总目》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总目》的学术价值:

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评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④

① 《明清时期两种对立的小说论——金圣叹与纪昀》,载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

② 王昶:《渤海诗传》,卷一六,《蒲褐山房诗话》。

③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二。

④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自《总目》出,不少目录学家把它奉为楷模加以仿效。阮元指导编成的《天一阁书目》、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翟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基本上都是按照《总目》的体系分类和编排。在《总目》的启示下,阮元进呈“四库未收书”一七四种,又刊成《四库未收书提要》五卷。孙星衍“拟以善本及难得本进御”,亦仿《总目》的编写形式,先后撰成《廉日居藏书记》与《平津馆鉴藏记》。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编纂,也从《总目》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总目》不仅以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方式影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而且以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及历代著作要旨的概评,指示着士子读书、研究的方向。龚自珍称他读《总目》是“平生为目录之学之始”。^① 陈澧向张维屏请教读书之法,张氏告曰四库提要,絜其纲领,千门万户,可从此识其途径,渐可升其堂奥。^② 张之洞在《轩轾语》中向读书士子们宣传:“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又说:“《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余嘉锡也指认:“《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鲁迅在为青年开有关中国文学阅读书单时,则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列为第一部应读书。

围绕《总目》的专门性研究,早从清代乾嘉以后便逐步展开。但初期的研究,尚呈散在式,大量的有价值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各种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中。直到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与胡玉缙撰、王欣夫整理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出,此种情形方发生改观。随着日益增多的学者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种以《四库全书》和《总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四库学”悄然形成。

① 《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自注。

② 转引自胡楚生:《经生与烈士》,《清代学术史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2月。

传统“四库学”虽然成就卓著,但它对《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研究基本上沿袭刊误、补正、考核、纠谬的朴学学术路数。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自序》对这一治学方法有生动描叙:

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轻重,而后笔之于书。

对“细如牛毛,密若秋荼”的微观问题的审辨和重视正是朴学的一大特色,它象征着庄严的学术理性,显示出严谨的学术责任感和渊博深厚的功力。

然而,对《总目》的纠谬补遗决不可能真正深入这部大书的堂奥,事实上,《总目》一如中国古代其他目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蕴藏着活生生的灵魂,遗憾的是,向来的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似乎从未把中国古典目录纳入自己的视野。

二 中国古典目录的文化品性

将《总目》置于文化视野下进行考察并非笔者的刻意出新。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产品,书目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具有自身的文化品性。

中国古典目录起源于刘向时代。^①《汉书》卷一百下《叙传》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目录”一词大约源于此。

自从刘向《七略》问世以来,目录学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发展。在近二千年的历史岁月中,目录学家对“目录”和“目录学”

^① 有学者称,成于两千余年前的条列六十四卦的《易·序卦传》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目录,姑备此说。

进行了日益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宏富的议论。而这些议论显示,人们意念中的“目录”,始终是作为“读书工具”或“学术指南”而存在。我们熟知清人金榜关于《汉书·艺文志》的评价:“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①我们也熟知今人余嘉锡关于《总目》的评述:“提要之作,……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②他们虽然谈的不过是《汉书·艺文志》和《总目》,但却基本上可以代表汉以来文化人对目录功用的认识。

然而,把目录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南以及“读书之门径”并不能穷尽中国古典目录的本质。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中国古典目录先天就蕴含着固有的文化品性。其表现可见于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任何一部书目,实质上是对一批相关图书资料的认识,而此种认识,只可能是主体的认识。由书目组织编排的图书,也不是纯粹客观的对象,而是图书世界中同主体价值观念、认知水平、思维方式、致思趋向相适应,处于主体特殊视角下的对主体有现实意义的那一部分图书。我们在古典目录的序言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其旧录可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什么书属于“文义浅俗,无益教理”?什么书属于“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这就要取决于编纂者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了。因此,仅“著录”二字,其中便大有深意。

分类编目与“部次甲乙”是目录的基本内容。而如何部次,实际上也与目录创制者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从大处而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本身就表征着它们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不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引,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6 月版,第 194 页。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同地位。从小处而论,图书前后的编排也往往别有含义。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总目》别集类九对《宗忠简集》和《龟山集》的安排。《宗忠简集》的作者是宗泽。《总目》对他极为称赞:“泽孤忠耿耿,精贯三光。其奏折规划时势,详明恳切。当时狙于和议,不用其言,竟无收拾其文者。”《龟山集》的作者是杨时。“时受学程子”,“开闽中道学之脉”。虽然杨时“入南宋日浅”,“然南宋一代之儒风,与一代之朝论,实皆传时之绪余”。《总目》编纂南宋诸集时,“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验当年之时势,可见世变之大几矣”。^①

对图书加以分类编排,是古今中外目录的普遍形式,而中国古典目录的一个极重要特点,便是“不徒为甲乙部次计”。中国目录学的开创者刘向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在作分类书目。梁阮孝绪《七录》序说:“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章学诚因此阐发自己的意见说: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计,仅乃卒業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②

按章学诚的意见,目录并非仅仅是“甲乙部次”的分类编目,它应该有一个学术的内在架构,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故“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③ 为了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集部,《宗忠简集》条,《龟山集》条。

② 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③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